



## 南通历史上的城市道路保洁

门程太和

城市道路保洁是一个城市管理能力与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南通市街道专业清扫始于民国34年(1945年),南通县警察局管理的清道夫负责南通城市中心区大街清扫和清除垃圾的任务。以城区十字街为分界线,分为四块,即西南组、东南组、东北组和西北组。清道夫于每日清晨起作业,扫完为止,不分班次。清扫的范围十字街向西至西吊桥(今和平桥),十字街向东至东吊桥(今友谊桥),十字街向南至长桥,以及环城马路,从西城门口起向南到南城门口再向东后拐弯向北至东城门口止(即今环城西路南段、环城南路、环城东路南段)。警察局派警员监督,往往以碎纸片散在马路上多少来检查是否扫扫过。清道夫将自己打扫、收集的垃圾临时堆积在濠河边的空旷处,卖给郊区农民豕田。

上世纪50年代初,南通城市主要街道由垃圾清运工人清扫、清运。清扫面积为10万平方米。主要用扫把清扫,用箩筐、竹畚箕及人力板车等运出城外。1956年,市清洁管理所设专职人员打扫。1960年人民路拓宽改造竣工,清扫面积成倍扩大。70年代初,清管所清扫道路面积达20万平方米以上。为了加强市中心道路保洁,80年代中期,环卫处购置2辆洒水车,用于道路冲洗保洁。当时,将人民路、桃坞路及南大街定为一级道路,其余的定为二级道路,清扫面积为377300平方米。1986年底,市区道路清扫定为三个级别,并根据道路清扫级别,制定作业规范。一级道路每天凌晨一大扫,全天保洁;二级道路每天凌晨一大扫,下午保洁;三级道路每天一大扫。清扫要求做到“五无、二通、一不”(即路面无垃圾、无瓜果皮壳纸屑,路牙无积泥,无漏畚、漏扫,果壳箱无隔日杂物垃圾;阴井盖清洁畅通,清扫分段交接处各向前清扫3米接通;桥上及河沿路面的垃圾杂物等不得扫入河坡、阴井内)。同时实行“三定”,即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按照省城乡建委制订的环卫作业劳动定额标准执行。其工作量为:一级道路5000平方米/人·日、二级道路6000平方米/人·日、三级道路7000平方米/人·日。质量实行三查,即自查、互查和处部每月组织专项检查,评分考核。与此同时,还实行了道路清扫“四公开”,即公开保洁员工号、路段名、服务时间、监督电话号码。以此将道路清扫质量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1998年,根据建设部《全国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统一劳动定额(试行)》,按新的劳动定额,一级道路3800平方米/人·日、二级道路4800平方米/人·日、三级道路5800平方米/人·日,市区部分环卫单位调整了人员配备,减轻了环卫保洁人员劳动强度。

民办保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民办保洁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门前三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居民各自负责门前的卫生保洁、秩序管理、绿化保护;二是卫生包干区保洁,由某一单位指定专人负责该地段的卫生保洁工作;三是各居民委员会指定人员负责指定地区的清扫工作。从1974年起,城区各街道办事处设有专职卫生干事,各居民委员会设有专职卫生主任一名,居委会雇两三名不等的退休工人或里弄闲散人员为民办保洁员,负责后街里巷的卫生打扫,全市区约11万平方米。这样,就形成了环卫专业队伍负责主次干道、民办保洁员包干后街里巷打扫的环境卫生网络体系。自90年代起,随着旧城改造推进,新建小区增多,各居民小区、房产开发公司相继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物业管理公司,民办保洁走向多元化。1995年市区拥有民办保洁员500多名,打扫面积约16万平方米。至1999年止,市区有200多个居委会和数十家新村物业管理公司,民办保洁员达千人以上,保洁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

###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 海门除虫菊

□李元冲



海门除虫菊

### 江海风物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海门县(今海门区)西部地区曾大片种植一种菊科类植物——除虫菊,这是海门西部地区的一种特色作物。除虫菊开的花是一种十分美丽鲜艳的菊花,以白色为主,可作花卉种植。但在海门种植的除虫菊不是用来观赏的,而是用于商品种植的,其商品部分就是除虫菊的花。除虫菊是一种无公害的杀虫植物,具有广谱杀虫性,一旦害虫接触到,菊花内会分泌一种除虫菊素迅速嵌入害虫的神经系统,将害虫迅速击倒,并致其死亡,但对人和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却不起作用,也不会人在人和哺乳动物的体内存留,所以它是人类最安全的杀虫植物之一。除虫菊及其提炼的除虫菊素,是蚊香、灭蚊片、避虫油、灭虱粉等卫生用品以及敌杀死、速灭杀丁等农药的重要原料。

除虫菊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70—100厘米左右,株、叶为银灰色,生长期约21个月(630天)左右,其中营养生长期570天,生殖生长期60天左右。第一年秋播育苗,第二年移栽种植,第三年抽梗开花。花瓣主要为白色,亦

有少数红色,花芯为黄色。春天正是除虫菊花盛开的时候,和煦的春风轻吻着花浪,一定会使你陶醉在花海中。

除虫菊原产于西亚地区,后被日本移植,民国初年由日本传入中国,开始试种于上海蒲淞区(民国时上海市的一个区,今沪西一带地区)试验场。海门除虫菊的种植始于民国23年(1934),由上海化学工业社的倪姓驾驶员从蒲淞区试验场引进种籽后给其兄倪华才(家住当时的天补镇光荣村,今为三星镇光荣村)试种0.4亩,第三年试种成功,收花35公斤(干花一下同),售于上海德基工业社,价格颇丰。在其影响下周围一些乡镇的农户种植渐多,但由于销售渠道不便(需销往上海),影响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全县种植面积徘徊在500亩左右,产量徘徊在20吨左右。

解放后建立了供销合作社,供销社为民所想,于1950年海门县供销社专设除虫菊收购部。1951年除虫菊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1625亩(数据来源于《海门县供销合作社志》——下同),当年海门全县总产量65吨,海门县供销社收购33.5吨。其时上海日用化学工业公司、上海三星公司、德基工业社等厂商也纷纷来天补及周围一带设点收购除虫菊,进一步促进了除虫菊种植的发展。除虫

菊的种植地域也迅速从海门的天补扩大到当时的三星、三和、德胜等乡镇及南通县(今通州区)的川港、姜灶、通海等乡镇,继而如东、启东等县的一些乡镇也有少量种植。由于该次除虫菊的种植之风发源和发展于海门,所以被业界称为“海门除虫菊”。1953年海门县种植面积达3906亩,总产161吨。1958年海门县种植面积达到创纪录的4402亩,当年县供销社收购除虫菊花180多吨。

除虫菊由于价格的大起大落,且其生长期较长、培管成本较高,所以影响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以收购价格的大起大落为例,1951—1952年每公斤收购价格为2.80—3.00元,1953年的种植面积迅速发展至3906亩。但1954年后降为每公斤0.98—1.18元,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种植面积迅速下降,1955年种植面积仅为464亩。1957年除虫菊收购价格提高为1.70—2.00元,除虫菊再一次得到发展,以致于1958年的种植面积达到了4402亩的海门历史最高峰。1959年由于供过于求,国家对除虫菊实行计划种植、计划收购和计划调拨,海门除虫菊的种植面积下降。1960年经计划调整后的全县种植面积为989亩,之后继续下滑,1961全县实际种植269亩。1962年全县实际种植仅80亩。

但62年以后,市场对除虫菊的需求量大增,为鼓励农民种植除虫菊的积极性,国家对除虫菊的种植采取奖售政策(出售除虫菊100公斤奖售化肥150公斤)。1963年种植面积虽有少量回升(当年种植面积为263亩),但由于除虫菊种植周期长,且与当时正在价格上升的薄荷油等作物的经济收入相比,相差较大。如以1966年的薄荷与除虫菊的收入比为例,薄荷油的平均毛收入为182.51元/亩(收购价),而除虫菊的毛收入仅为109.85元/亩(收购价)。如果计算生长期因素,薄荷的净收入为108.48元/亩,而除虫菊的净收入仅为41.10元/亩,为薄荷的38%。因此除虫菊的种植面积未能进一步扩大。1978年因本县的三和等蚊香厂生产蚊香的也需要除虫菊作原料,除虫菊的收购价格曾提高到每公斤2.72—3.00元,但由于三星、天补地区绣品业的发展,除虫菊的种植再也没有发展起来。此后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制造卫生用品和农药的原料基本上被成本低廉的化学产品替代,除虫菊的种植面积进一步减少,上世纪80年代海门全县种植已不足100亩,1989年全县仅剩2亩,1990年以后除虫菊的商品种植已基本消失,仅有除虫菊的花卉种植。

# 八仙桌

□孙同林

### 传家宝



苏中平原上的农户家中,家家都有一张或几张桌子,桌子中有方桌有圆桌还有长条桌等等。

八仙桌是民间传统家具之一。因为桌面四边长度相等、桌子的每边均可坐二人,围坐起来就是八人(犹如八仙),故民间雅称八仙桌。

古谚有云:“床不离七,桌不离九”,说的是八仙桌的规格尺码必是逢九,八仙桌边长多为木尺的2尺9寸,4支桌脚的高度也是2尺9寸,相当于现在的0.9米。

斗宝儿是八仙桌中的佼佼者。斗宝儿是音,民间有人或叫它“对拐儿”。

“拐儿”是指八仙桌的用料,为单数,在民间,比较常见的八仙桌有九料、十一料、十三料等等,最简单的称之为“闹桩儿”桌子。八仙桌以料数越多档次越高,料数也代表着做工的精细和精致,我家的斗宝儿为“十三料”。

我家的桌子年纪不小了。祖父说是

土改的时候分得的,那时候他还年轻。由此推断,我家的八仙桌比我祖父的年纪还大。祖父说不上原来桌子的主人是谁,他不晓得,我们就更无从知晓了。我小的时候,我家的这张桌子就放在老屋明间的正中间,平日里,母亲每天都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八仙桌显得庄严而神圣。后来,因为家里养蚕,不得不将其挪开,直到不养蚕的时候再恢复原状。每次搬动它颇费周折,必需由身强力壮的父亲来完成。

老桌子是什么材料的,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定论,祖父说桌面的边框和四条腿是作榫的,桌肚子是柏木的。因为柞木结实,柏木细密。但也有人说整个桌子是全柞木的,否则不会有这么重。老桌子的重我小时候是领教过的,儿时伙伴们玩捉迷藏游戏,藏在桌子底下,伙伴中数功成力气大,往往藏在桌子底下被别人找着了,他就把桌子拱起来扛着走,但在我家他拱不起来,他就骂我家的桌子太重,是哪个笨蛋做的笨桌子。于是,我们就都称我家的八仙桌是“笨桌子”。

前几年,笨桌子忽然吃香起来。先是

有周围不少年轻的木匠前来参观学习,细量尺寸,描形绘图,然后回家仿制,于是,村子里便有了不少我家“十三料”斗宝儿八仙桌的后代。粗看上去似乎与我家的桌子无异,但稍稍细看,人们就大摇其头,说仿制品终究是仿制品,无论是做工还是样式都无法与我家的桌子可比,不久,村子里竟传出一条歇后语来:“孙家的斗宝儿——精致。”后来又有淘古董的人来看我家的桌子,评头论足,说是这张桌子质量不下金丝楠木的,总是因为价格谈不拢而告吹。其实,更是因为我不舍得放手,它是我家的传家宝呢。

我家的八仙桌从未上过油漆,属于天然的色泽,因为年代久远,生活中的烟火将其熏染成朱红色,桌面的纹理依然清清楚楚,木料并接处没有一丝斧凿痕迹,多少年了,桌缝依然紧密无间,这是最让行家们称道的。据业内人士称,我家的桌子最初是做过生漆的,用的是本色,保持了木头的原色,是不是呢,我没有考证过。但我家的桌子是一张原生态桌子这是无疑的。

早先,祖父曾在斗宝儿桌上祭祀,因

为珍爱,每每在上祭品的时候,祖父都叮嘱我们要轻拿轻放,尤其是担心香火会烫了它。父亲继承了祖父的做法,不允许随意使用斗宝儿,就是请客,也不肯用它。因此,斗宝儿八仙在我家一直是一个“惯宝儿”八仙。

自建成小楼以后,八仙桌被放于楼上,背倚香案,足不出户,只有来了客人,才将它请出来,在上面玩几把扑克,成了地地道道的一位小家碧玉。村子里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我家的斗宝儿八仙桌子了,直到前年房屋搬迁,老八仙桌被搬了出来。哇——!众人眼前一亮,发出一片惊叹,在他们眼里,它可是大家闺秀呢。

八仙桌并没有因为众人的惊叹而骄傲,没有一点张扬的意思,依然默默静立在我家的新屋子里,它完全习惯了静寂恬淡的生存环境,保持着一副洁身自好的作派,它好像整天沉浸在回忆之中,回忆曾经的一代代主人,回顾曾经见证过的过往历史和身边的一个个过客。

八仙桌,祖辈们将其传到我手里,我会完好地将它传给后代。

# 晚清如皋县衙人员编制

□何台

### 史海回眸



明代,如皋县境在广陵(今扬州)东南境,“当通(州)泰(州)间,负海枕江,角倚鼎峙”。县治在扬州府东南距府城145公里,距泰州城80公里;东至掘港巡检司65公里,抵海80公里;西至泰兴县分界30公里;南至石庄巡检司抵江30公里;北至西场巡检司15公里,抵海45公里;东南至白蒲镇与通州分界35公里;西北至庙湾与泰州分界15公里。

东西横宽90公里,南北纵长86公里。清乾隆时,如皋县城东境、西境、北境、东南境承袭未变,南至石庄巡检司30公里,抵摩河山、竹排岭60公里,西北至立发桥与泰州分界22.5公里。乾隆二十三年(1758)由直隶通州正堂、如皋县知县会勘,通、如涨沙以南通的崔马圩,如皋的永兴圩为界,并于两岸之间立界碑为记。

晚清如皋县衙的主要职官有六员,即知县、县丞、教谕、训导、典史和巡检。他们的职权分别是:知县负责全县行政,为正七品。县丞是知县的辅佐,正八

品。教谕是县学官,掌文庙(孔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训导,也是学官,主要是教诲训导,协助同级学官教育所属生员。典史,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巡检为武官。晚清如皋的县丞长驻掘港场(今如东县城),巡检驻石庄、西场(今属海安市)。六员职官都有数量不等的属员,分管不同的工作。光绪二十二年(1896),湖南人龙璋任如皋知县,时有属员70余人。其分工是:门子2人,皂隶13人,仵作6人,马快8人,民壮28人,看监禁卒8人,轿伞扇夫7人,斗级4人,库子4人。县丞主要属员有6人,他们是:门子1人,皂隶4人,马夫

1人。教谕有7名属员,其中斋夫3人、膳夫2人、门斗2人。典史6名属员:皂隶4人,马夫1人,门子1人。巡检有14名属员:皂隶2人,弓兵12人。[注:门子即管门的人(相当于现在的门卫、保安)。皂隶是差役,仵作是检验死伤(相当于现在的法医),马快是指骑马的捕快(公差),协管缉捕盗贼。民壮由服役的乡民组成,定期轮换,负责官府差遣,担任迎送,拘捕和传递文书。斋夫也称庙祝,是文庙中掌管香火的人。膳夫掌管文庙的饮、食、膳等事务。门斗是文庙里的公役]。上述人员,看似员额不多,但仍感人俘于事。